

# 《李文学起义》資料汇集

云南大学

历史系七二级李文学起义调查小组编印

清末哀牢山各族农民起义

(征求意见稿)

## 毛主席语录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三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

## 序 言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历史斗争的焦点。一切剥削阶级及其御用文人，为维护反动统治，总是肆意攻击农民革命运动，极力抹杀农民革命斗争推动社会发展的伟大历史作用。拼命鼓吹“帝王将相”、“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而把真正创造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污蔑为“渣滓”，咒骂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是“造反”、“叛乱”、“暴乱”。被颠倒了历史，我们今天必须把她重新颠倒过来。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压迫，曾经爆发过大大小数百次的反抗斗争。认真学习和研究农民革命斗争历史，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是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太平天国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在我国云南省的哀牢山区爆发了一次名族农民的大起义。哀牢山位于云南省的西南部，伸入印度支那半岛，海拔二千多公尺，全长一千六百多华里，由源头到边缘，包括巍山（蒙化）弥渡、梁东、南华（镇南）楚雄、双柏、姚沅、新平、墨江、元江、南涧、元阳、金平，屏边等十五个县的全部或一部分，哀牢山脉之西，有蒙乐山脉（又称无量山脉），以把边江（上游称中川河，下游李<sup>弘</sup>江）为界。东有元江山脉（又称辟云麓山脉）以元江（上游称礼江，下游称红河）为界。（参看插图）

哀牢山区民族甚多，除汉族外，还有多种兄弟民族，其中汉族占全山苗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兄弟民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以新平县为中心，哀牢山可分为上下两段，上段居住着彝、傈僳、苗、回、苗、布朗、傣等族；下段族别繁多，但绝大部分是彝、哈尼两族的支系，如“善聪”、“拉乌”、“卡董”、“尼苏波”、“必约”、

“和派”等族，汉族则两股均者。在封建社会，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的统治和压迫，一贯推行着“以汉治夷”、“以夷治夷”的反动政策。在各族人民中间制造民族隔阂和民族纠纷，挑拨各族人民的阶级斗争视线，以达到剥削和奴役各族人民的罪恶目的。但是，具有反抗斗争传统的中华各民族，从来都是不甘屈服的。各族人民长期饱嘗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痛苦，共同的命运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另外，各族人民在开发边疆的生产斗争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族人民紧密联合起来，用革命手段，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规律。

这次农民起义的主要领袖有：大元帅李文塔（又叫李正学）彝族，对坤田以正·卡董族（哈尼族支系），参军王嘉清，汉族，上将军李学东，四川小凉山彝族。他们出身贫苦，对封建地主阶级怀着刻骨的仇恨。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们一个脱颖而出成为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他们领导着哀牢山西的彝、傈僳、白、回苗、布朗、傣、哈尼、汉等各族人民，对清王朝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哀牢山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通过对哀牢山各族人民起义的学习和研究，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阶级斗争史，是一部农民阶级通过暴力革命不断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正如毛主席教导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sup>(1)</sup>

在编写这本书之前，我和师生一行十人，深入到起义活动的区域进行了历时三个多月的调查。虽然事隔现在一百多年，但由于得到当地各级党委的帮助和支持，广大革命群众的热心协助，使我们获得了一些海关起义军的材料（在调查报告部分），进一步证实了哀牢山地区在一百二十多年前（1853年）确实爆发过一次规模很大的各族人民大起义；革命英雄们的史诗般的业绩，已铭刻在各族劳动人民的心中，成为鼓舞人们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巨大力量。我们在编写过

程中，也参考了过去的一些调查材料。由于我们的历史知识有限，时间仓促，这本小册子一定还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 目 录

- 一、革命前夕的云南
- 二、李文忠天生惹起头
- 三、农民政权的建立和各项革命政策的制定。
- 四、根据地的扩大和各族人民的团结。
- 五、通关失守
- 六、肿瘤保卫战
- 七、英雄的业绩，不朽的功勋

### 一、革命前夕的云南

鸦片战争前的清王朝，政治上腐朽反动，贪官污吏，横行天下，社会经济停滞不前。全国大部分土地集中在皇室贵族，官僚地主手中，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劳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不顾人民的反对，执行一条对外妥协投降、对内血腥镇压的反动路线。在英国侵略者的逼迫下，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从此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马克思说：“一八四〇年战争失败以后，中国所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鸦片消耗，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溢，外国竞争对地方生产破坏的影响，全部国家行政机构的腐败——这些情形就引起了两种结果：旧捐税更加繁重而难以担负；旧捐税外又加上新捐税。”<sup>(3)</sup>据估计一八四三年～一八四六年，平均每年输出白银约三至五百万元。④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严重的银贵

钱贱的现象。当时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炮钱，清政府的赋税是抽银而未抽税。用铜钱折成白银或抽炮钱税，劳动人民的负担无形之中就增加了很多。英美对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商品，破坏了我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大批手工业破产。中国人民民族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又受外国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云南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耗财立逋于；而生财于道带……摊派加捐，上下交困。”<sup>5</sup>清政府为了偿付战争的赔款，强行命令“所有名目着火、少赔、摊赔、代赔、造版、襄城三款，着各省督抚，河督、行属实缺同道府厅州县各负，无原本身应赔及代赔款项，具看照该部所开清单，勒限催追完妥”。云南每年担负赔款三十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云南常年田赋的一倍半。加之清王朝为了防止和镇压云南人民的反抗，不断地增加驻军名额和官兵，仅1845~1848年之间，云南的统治者贺长林、李星源、林则徐三总督之内，就用去七十万两白银（其中还不包括各地“筹措军费”的土旅费）。一切赔款，征费并反以反统治阶级的搜刮滥用，都以名目繁多的布捐杂税，转嫁到各族人民的头上。另外，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影响，云南出现了现银百万两的商业资本，他们用贱买贵卖、高利贷等方式盘剥劳动人民。从劳动人民头上榨取的钱财，除供朝廷外，一部分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一部分用来购置土地，造成土地迅速集中的现象。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结合在一起，向劳动人民进行竭泽而渔的搜刮，千百万农民被驱入于贫困、饥饿和流离失所的深渊。

清朝政府派到滇军队伍的官吏，裹藏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衣钵，极力推行“尊王攘夷”的反动政策。他们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转移各族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视线，经常挑起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推行“以汉攻夷”、“以夷治夷”的反动政策。汉庄王利用“汉尊夷卑”的反动道教，给彝族劳动人民规定了许多土政策，把他们打入人间地狱，剥夺他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彝族劳动人民被认为是最低一等，只能做门坎，听任庄主残踏，庄主规定彝族农民“不准盖一丈六尺高的

房子，不准在墙上开窗，不准跟汉人谈亲通婚，不准坐席，不准穿有领的衣服，不准穿有纽扣的鞋；不准骑马脚边，不准抽长烟袋。”等等。这些规定就是要劳动者反面贴耳的让庄主随意揪摸摆布，绝不容许逾越“尊卑有序，妻妾有别”的鸿沟。

辰年山的统治者——庄主，享有封建领主式的特权，对各族人民的剥削一般要比内地残酷，名族人民的苦难比之内地更为惨重。名族农民向汉庄主和神向的，每年要交上交纳沉重的地租之外，连年过节或皇婚丧葬时，庄户（即佃农）还必须给庄主献“贡礼”。不信庄主送礼鸡、和肉、火腿、香油、私米、布匹……的庄户，就会被查出。科子表齐后，庄户还要给庄主送一位“伙郎”（即伙食），用折子将庄主的老婆儿女拉来，让他们大吃大喝，不仅送酒席，也要守宿。庄主又规定，每一家户每年要交纳布庄主做向工四石，名曰“四利二”。平时庄户要替庄主家挑水、砍柴、洗衣、抬轿……要随喊随到。民族疾呼，若是遇到庄主家盖房、修路、伐木等，名族农民还要担负无偿劳役。名族农民不仅受地租的剥削，而且被数不尽的豪强劣绅折磨得喘不过气来。庄主靠榨取农民的血汗过着“穷奢极欲”的寄生生活。劳动人民苦不堪言，稍加反对，庄主就用武装加以镇压，甚至肉刑笞刑衙门随意捕杀穷苦人民，把贫苦人民的人身自由剥夺于三游云。

辰年山庄的汉庄主拥有上万亩的田地和山林。资本主义的侵入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刺激了地主阶级的贪婪的欲望。他们为了积累更多的钱财，从各方面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汉庄主多半经营商业和高利贷，名族人民向庄主借债，利息高达百分之六、七十，当地人口：“半打滚”，利息滚越重，永远化还不清庄主的阎王帐。《普乐县志》中有关记载。当地高利贷者对彝族人民的剥削情况：“至积成债，二、三年一换本利，不过期年，一两元限可至十数两，每酒一盆，换粮食一斗，零星记账，至一、两年，始能散放取。故夷人借贷甚作，不得自食，废以僵僵，饥寒交迫，逼讨之状，急于星火。于是率往往背城奉利，不至，偿以田地，付以儿女，夷人非死则逃，而垦村产业

—尽为他人所有。⑧这种状况就是由于地租、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三者密切结合造成的。土地更加集中，阶级分化加剧。如墨江彝族聚居的荒树寨，全寨52户中2户地主就占有全部土地的43%。地主阶级霸占得到的土地，无情地剥削农民。从而造成贫者日饥，富者愈富，不少彝族自耕农丧失了土地；流离佃农或雇农，被迫向庄主租种土地，庄主又以“放四收八”苛刻名少教民族农民。就连汉族农民也耕种庄主的地，而庄主竟四成租，而多少少数民族农民就得交八成。这些的官僚和财主还利用手中的特权，对老族农民实行层层剥削，有诗的民谣说：“上吃窝尼（指哈尼族）下吃摆夷（指傣族）中间还有棵保的。（指尼苏族）”这首民谣生动地刻画出官僚和庄主的剥削本相。从哀牢山一部分少数民族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景象，就可以看出整个哀牢山各族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

“咸丰五年（乙卯 1855年），久旱无雨，颗粒不收，夷众皆虎口拒饿，往山野掘藤根刮粉为食。”⑨各族人民被逼得家无隔日粮，为了活命，只有上山挖掘树皮草根充饥度日。但是“天旱租不旱，租于鬼狂帝”。穷凶极恶的地主豪绅，官吏衙门如虎，到处横征暴敛，破作物稼，无所不为。连反动统治者一再叫嚣作的《征租歌》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情况是：“民竭於岁歉，始得救才活，上缺饱父母，下使妻子育，稽租者未还，官租催已重，致吏讼到门，儿童昼夜哭，囊涩断腹空，无计角信翁，恤吏到公庭，忍泪眉锁蹙，廉此不能完，分忧深系族，含恨不能归；家人挂藜目，日出至夜分，曾未渴餧粥，猿雨夹瘴风，寒粟满饥囊……”。当时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首《卖儿叹》：“三百戚买一升粟，一升粟饱三日腹，穷民赤手何可求，携男提女街头鬻。明知家儿难救饥，……得钱聊缓须臾饥，到口囊飧即儿肉，小儿不知离别恨，大儿解事依亲哭，哭山穷哭走行乞，……阴风吹面各无声，拭泪盈襟望儿回，家儿归来夜难寐，老鸟哑哑啼破屋。”这首《卖儿叹》暴露了当时社会的腐朽反动和劳动人民的悲惨状况。说明整个哀牢山跟全省一样已处于“猪羊遍野，凶穷财尽，

“家破人亡”的景象。汉族人民无法再生活下去了，统治阶级也无法再统治下去了。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各族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逼得他们除了拿起武器实行反抗以外，已无路可走。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一八五三年（清咸丰三年）二月，在襄平山西南华县属波罗村，爆发了彝族农民赵彩云、赵彩云兄弟两人领导的五、云苗农、汉两族人民的起义，起义军反抗地主的剥削和官吏的欺压，跟地主武装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并围攻南华县城，首先举起革命造反的大旗，揭开了襄平山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序幕，一场阶级大搏斗来临了。

## 二、李文学天生劳苦人

李文学，一八三六年九月出生在孙渡县瓦户村一个彝族佃户家庭。全家五口人，租种着庄主潘云瑛的一块瘦地，一年只能收养一石。这么一石杂粮，就是不抽祖子，也不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何况庄主还要从中剥削地租四十。李文学家里经济吃了上顿没下顿，他的父亲还得经常外出打短工，做石匠，以此打猪来维持全家的生活。李文学长到十一、二岁时，被潘云瑛赶去“抵租”。从此，年幼的李文学便被投入人间地狱，过着非人的奴隶生活。

善水里泡大的孩子，具有顽强的意志。李文学年纪虽小，但他所受的屈辱和忍受的压力，使他养成一种勇敢和不怕困难的精神。他身体魁梧健壮，力大无穷。他在庄主家放牛、放马、打杂，里三外三的活计都干。狠心的地主还故意往他嘴里塞石块，强迫他背大石条铺马路，还不给他吃饱。五十多年的人生生活中，他做的是牛马活，吃的墨猪狗食，穿的是破麻布，住的是牛马棚。长期的折磨练就了他坚硬的性格。他对地主阶级恨之入骨，带三夜牙切齿地骂：“我必杀尽庄主，灭我族家之耻。”他对乡亲们如同自己的亲人。他帮穷人说话，替穷人出气。有的长工病了，他让叫人家休息，独自一个人把几个人

的活干完。乡亲们有事都愿意找他帮忙。后来他在帮庄主赶马做生意的时期，结识了许多贫苦农民，李文学对他们的十分友善。他从小就胸怀有碗口那么大；彝族人又称他“得脑木”（彝语：大肚膀，大肚子）。老百姓传说他是蛤蟆星下凡，对他更加尊重。他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

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年），久旱无雨，五谷不收，乡亲们多往深山挖野菜树根充饥，有的离乡背井，出门讨饭逃荒。但是“天旱租不旱，赋税照往常。”庄主那虐农民的死活，他们瞪着狼眼，擦着皮鞭，挨门挨户来催租逼粮，每升粮还要外加三文铜钱。袁军人民挣扎在“瘦骨嶙峋，无计通信宿”的死亡线上。李文学的父亲早被饥饿逼得有气无力，可恶庄主还硬逼着他进山打猎来还债，他不幸被野兽咬伤，惨死在山里。接着，李文学的幼妹王秀红也饿死了。天沉沉，路茫茫，天下哪还有穷人的活路啊！李文学的母亲悲痛至极，被迫服毒自杀，幸被王泰所救，李学东二人救活。

王、李二人原是四川一家豪强地主的奴仆，同遭迫害，先后从豪强大家逃出，在广西相遇后，于一八五三年参加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部队。由于对统治阶级怀恨刺骨的仇恨，王、李二人作战都非常勇敢。后来，李学东被提为侍卫长，王泰改被授为帐前文书，为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太平军的教育下，他们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并熟悉了太平军的一些方针政策。在一次作战中，李学东不幸负伤，由于养伤，李学东和她的战友王泰所没有跟上，李学东伤愈后，太平军已走远。他们看到当时整个中国已处于“满城风雨，遍地愁怨”，断然决定入海，“征程起头，应援天国。”他们不辞辛苦，爬山涉水，以风尘先生的身份为掩护，在1854年春深入到凉山彝族聚居区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工作。他们跋山涉水，串百家，同屋同暖，和穷人亲如一家，他们帮穷人看病煎药，不收分文，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们走访了许多村寨，在各族人民中间宣传革命道理，大讲太平天国的大好形势，揭露

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罪行，从而得到群众的信任和爱戴。李母被救活后，王泰阶面对情绪激昂的群众，认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趁此又对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他说：“我们与天的贫苦，不是一家两家，整个哀牢山的贫苦农民都受庄主的压迫剥削，我们不除掉庄主，不有天清朝的反动统治。”“我们贫苦的农民就会永远作牛马。”李学东慷慨激昂地说：“我们与其为奴仆马牛不死不活，不如拔刀而起，东捲城，戮庄主而不活”，实际上各族人民只有拿起武器对清朝反动派实行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王、李二人同人肺腑的一席话，说出了李文学及群众积压在心底几十年要说的话，群众摩拳擦掌，决心起来斗争了。这时李文学也激昂地说：“我决心要为哀牢夷族人民除害，现在又有王地师和李学东弟的帮助，我们就更不怕了，我们就是要起来造反。”王、李二人又给李文学讲了很多太平军的革命道理，更加坚定了李文学起义的决心。在王、李二人的帮助下，李文学串联了周围村寨的一些群众和杞绍兴等一些基本骨干力量。杞绍兴是苴猫苴村人，彝族，从小就给地主帮工，因长期服侍庄主少爷读书，学得了一些文化，文墨很好，大家也很尊敬他。李文学、王泰阶、李学东、杞绍兴等人的组织串联，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作好了准备。共同的命运把各族人民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五月十日），李文学秘密通知王泰阶、李学东、杞绍兴、徐东位、罗自美、李淳明、李安东等骨干，并率领着五千彝族农民，在瓦户村后山天生营正式起义。这支起义军，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反动的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立誓师起义大会上，李文学慷慨激昂地发表了声讨封建剥削制度的战斗檄文，他说：“我哀牢夷民世代生息受尽了官吏庄主的欺凌和苛虐，自满清贵族统治以来，汉庄主与之狼狈为奸，致使我们夷汉穷苦农民食不就口，衣不敢作，白发苍苍呻吟于床，幼弱子女，扶门饥啼，如今刀架在脖子上还希望不死？矛盾胸膛，还能气险求生吗？目睹这样状况无不义愤填膺，我们只有举起造反的义旗，驱逐满贼，根除汉庄主。

希望彝、汉各族穷苦农民，携手起来共同斗争求得生存。”这一革命檄文，说出了哀牢各族千百农民的心声，它强烈地表现了农民阶级反封建反压迫的大无畏斗争气概，深刻揭露了反动的清朝统治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是造成各族劳动人民贫苦的根本原因，正确地指出了起义斗争的目标。刹时间，“铲尽满清腔骨，在搞汉族庄主”的革命喊声，震撼了哀牢山的林海峡谷，唤醒了哀牢各民族的劳动群众。鼙师后，农民起义军怀着世代的冤仇，高举着长矛和短棒，其势如猛虎下山，奔向密麻这个庄主要绅集中魔窟，把那些“贵族老爷”打得鬼哭狼嚎，无处躲藏。他们杀死了恶贯盈胸的庄主堵云淡，将庄主李正的房子作“帅府”，把庄主的财产、粮食分给农民和收入库存以备军需，李天培等人闻风不敢。死气沉沉的密麻村，沸腾起来了，男女老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昂首挺胸，喜笑颜开，农民们热烈拥护自己的起义军，积极参军、送夫参加自己的队伍。起义还不到十天的时间，哀牢、蒙自、大姚的彝、汉、苗、回、傈僳等各族人民，手持大刀长矛，像潮水般地涌向了起义的圣地——天生营，起义队伍又增加到了四千多人，浩浩荡荡，声势越来越大。起义人民一致推举李文学为“莫大元帅”统领起义军，推举王基伟为参军，赵祐关为副参军，李学东为上将军。起义军的英雄们以自己的革命行动，用思想的批判和武器的批判，痛斥了几千年来孔孟的“制刑有理，压直有理”的反动说教，和“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了过来。起义军的军旗再一次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只有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才能摆脱死亡和贫困。

天生营的星之三火一经点燃，各个布满干柴的哀牢山寨很快就燃起了熊熊烈火。各族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响应和参加李文学的起义军，他们解下腰间的麻布做旗幡，以牛角当军号，赶着骏马，驮着石头，手持麻刀短棒，纷纷走向各地的庄稼园、官府衙门。革命浪潮一浪接一浪。继李文学起义以后，云南全省各地，各族农民的起义烈火，也普遍燃烧起来。

一八五六年会泽一带的彝族、回族数千人起义。

一八五七年蒙自沙甸回族、彝族起义。

一八五七年宣威、晋宁、嵩明、寻甸、陆良彝族、回族、苗族起义。

一八五七年路南二万彝族起义攻占了县城。

一八五七年富源两千多彝族农民起义。

一八五七年祥云彝族起义，攻占了祥云城。

一八五七年武定、禄劝、富民、罗平，回、汉及傈僳族农民在彝族毕国保领导下起义。

一八五八年镇沅、墨江由以王率顾哈尼、卡查、碧约等族农民起义后加入李文学起义军。

一八五九年开远李升、陆本顾领导彝族起义攻占了河连街。

一八六〇年南华哨地彝族起义。

与李文学起义同时，大理回民起义，并攻占了大理县城。

农民革命风起云涌，使得云南反动派惊慌失措，他们调兵遣将对起义军大举进攻，妄图用武力一举把革命的新生力量镇压下去。一八五六年六月，清兵两万大举向滇西“进剿”，把大理回民起义军包围在弥渡红岩一带。面对大军被围，到底是支援还是不支援，王率顾起义军内部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部分将领主张以自守为主，按兵不动，其理由是，才起义不久，力量薄弱难以取胜，万一支援失利，危害极大。以王率顾为首的多数将领则主张，坚决出兵救援，增援回民起义军。他们认为，各族农民起义军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各起义军只有团结起来，互相支援，共同对敌，才能打倒共同的敌人——清朝统治者。如果隔岸观火，敌人势力逐步将起义军各个击破，最后全部镇压起义队伍。哈丙说：“唇亡则齿寒”，对回民起义军的支援，实际也是保卫自己。李文学坚决支持后一种意见，并且亲自率顾三千起义军披星戴月兼程赶到红岩截击清军。李文学身先士卒，一马当先，直冲敌阵，亲手杀死了清兵统帅。于大起义军战士在李文学的表率和

鼓舞下，无不以一当十，东得清军叫喊命令，死伤五千余人。敌人溃散，逃至楚雄姚关时，又遭到李文学的截击，死伤五千余，其余的残兵败将狼狈地往楚雄城方向逃窜，再次被埋伏在楚雄大石铺、清粮哨的由杞绍兴、杞彩顺带领的起义军的伏击。至此，两万清军能侥幸逃脱的已寥寥无几了。这次对回民起义军的帮助，大大加强了李文学起义军与各族起义军之间的革命团结，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潮流。

红若首战大捷，极大地鼓舞了起义军的士气和起义地区各族群众的斗志，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反动派气丧地承认：“夷匪凶猛，有勇当先，一可当百……，每闻夷匪吼声震山。”起义军的革命行动，粉碎了敌人各个击破和消灭各族起义军的迷梦。李文学起义在前方日益壮大，威震哀牢。

### 三、农民政权的建立和各项革命政策的制定

起义军在红若首战告捷，声势愈振。一八五六年十月，李文学率军凯旋回到蒙自，立即召集文武官员商议，筹建农民革命政权。

围绕着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问题，在起义军领导层内部产生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表现在李文学称王还是称帅的问题上。

混进起义军领导层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反动力量刘炳贤（注：刘炳贤，南华马街人，又名刘琛，破落地主，因向彝属等族挑衅不遂而投机革命，想借此大发横财；为人阴险狡诈，骗取了李文学对他的信任，在起义军中屡次提出错误路线，在图扭转农民革命的方向。且到革命失败时充当敌人内应，叛变投敌，给农民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大搞阴谋诡计，利用起义军领导内部之分将领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结，上窜下跳，造谣惑众，怂恿李文学称“彝家王”，妄图被统一了的八百多年前的“哀牢王国”。重新把哀牢山各族人民从祖国的怀抱中分裂出去。刘炳贤的阴谋罪恶目的正在于假借李文学称王来达到

禹南豪族起义军与其它各族起义军的关系，让清政府能坐而旁观地把各支起义军镇压下去。

刘炳质问朱反动路线一提出，就遭到王泰阶李文学等大起义军将士的反对和痛斥，他们痛骂刘炳是“以出卖起义军，献媚汉庄主的‘小人’和‘奸贼’”。他们坚持李文学只能称师而决不能称王的正确主张。他们认为称王的结果，李文学只能成为一个得不到各族人民支持的“草莽王”，如“称师为氏族暴谋利，无论夷汉名族莫不争附之”。李文学在听取两种不同意见后，也坚持支持了王泰阶等人的主张，刘炳的错误路线被否决了。

在于将士的努力下，根据正确路线建立了农民政权，确立了文武联制。参加起义的彝汉各族农民，一致推选彝族农民出身的李文学为大元帅，推选王泰阶（汉）为将军（军师），把张大东为将军管理军政财务、李泽东为工府掌管同僚军伍领金子，另设东、西、南三个都督府和左右两将军，旌旗推选，亲自委（彝族）徐东周（彝族）、鲁得助（彝族）、李学明（彝族）、序何乌（彝族）、李彩顺（彝族）等一批善于打仗的领导农民被选为将军或都督，各部首领等农民被派到起义军挂制的山庄，负责镇压地主阶级的反叛和贯彻执行府的各项工作政策，徐东周为右都督，李泽东为左都督、守麓街、龙街反蒙山山以西深甸云以北把张大东为右参军兼左都督，序何乌为右将军，守南洞、猫街以及蒙山山以南公郎诸山；李彩顺为左都督，其妃彩云为右将军，守河浦（即华县河街）、西舍（哈堵山），鲁得助为督粮官，何里启、董亮、鲁连环、何三祥，农民政权就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统一的权力指挥机构，保证了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专政，更有利于发动各族人民起来反抗清王朝的统治，使革命斗争不断向前推进。根据“剪除满清匪首，东绝汉界庄主”的政治纲领和路线，起义军又规定了以哀牢山为根据地，联合云南各地起义军，选出广西与太平军会师，共同推翻清王朝而作一套比较完整的战略方针。在后来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这一战略方针和政治纲领一直成为起义军行动的宗旨。